

研究中心主任樊纲指出，中国现阶段阶层收入差距应依靠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不能过分依赖社会保障制度来予以平衡。

樊纲认为，阶层收入差距的出现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中国走向经济全球化，建设现代化历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现阶段比较突出的城乡收入差距、就业者与失业者的差距等等问题，归根结底都集中在如何解决几亿农民进城就业的问题上。

他说，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在许多农村，农业收入已不再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取而代之的是农民出外打工的收入，过去以农为生的农民大多处于一种“不充分就业”的状态。正基于此，他估计，中国目前约有3亿左右的农民正处于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路途之上，而这一群体的存在正压迫着城市中1亿左右的低收入打工阶层，使他们的收入暂时难以发生质的提高。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以使社会达到一种“充分就业”状态。

因此，他强调，调节阶层收入差距不能也不应该过分依赖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一是因为目前的中国经济能力还不足以承担以太高支出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另一原因是，世界上已有的经验显示，给低收入者提供“造血”功能作用远甚于一味“输血”。他同时指出，现阶段有限的社会保障投入应该用于缓冲由于阶层收入差距而可能激化的社会矛盾，譬如加大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基础教育建设，以及设立农村特殊疾病的保障基金等方面。

最后，樊纲呼吁，中国的经济学家应充分认识到中国阶层收入差距长期存在的正常性及普遍性，并在此基础上注重理性分析，并最终给予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以更多更完善的良策。

萧灼基：

民营经济二次创业高潮来临

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说，随着政策理论上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重大突破，非公有制经济的第二次创业高潮已经来临。

萧灼基说，当前有些人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速度这么快，是不是要放慢一点？他认为恰恰相反，可以说当前非公有制经济的第二次创业高潮已来临。原因有五：一是在非公有制经济理论政策上有很大突破。以前我们是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定位，这种补充定位使得非公有制经济只能在有效范围内活动，现在则把非公有制经济提升到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个政策上的重大突破，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氛围。二是参加世贸组织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国民待遇已经是势在必行。三是国有经济正在进行战略调整，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问题是现在有些政府部门、理论界对有进有退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认为主要是退。这次国资体制改革，分层次管理，给地方政府很大权力，也给民营企业进入国企创造很大条件。四是当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解决国家很多经济难题的重要渠道。例如就业问题，今年我国需要安排就业岗位2400万个，但能安排的岗位才1000多万个，而国企现在主要是减员增效，富余劳动力很多，有一个庞大的下岗后备军。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当前解决就业的主要渠道。另一个问题就是民间投资启动乏力，这几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积极财政政策，风险很大，发展个体经济就能把民间的货币资金转为投资资金。第三个

是税收，凡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得好的，当地政府财政上就比较宽裕。五是非公有制经济本身的素质大有提高，在其他经济成分中已经表现出自己的优势。他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当前最具有经济实力、运作活力、发展潜力的经济成分，面临着第二次发展高潮。

俞晓松：

对外开放需要管理创新

中国贸促会原会长、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俞晓松近日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对外贸易不论对于政府层面、社会层面还是企业层面来说，都面临新挑战，对外开放需要管理创新。

他说，中国加入世贸的真正挑战首先在于中国政府管理外经贸活动的机制是否经得住这一挑战，中国“入世”所作的主要承诺，包括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削减非关税壁垒、政策透明化等，对政府管理均是重大挑战。

俞晓松认为，鉴于中国国情，中国与发达国家、若干发展中国家发生贸易摩擦将会增多，妥为处理而尽可能“共赢”，对政府、中介机构、企业来说都缺乏经验，并缺少监控管理机制，而处理多边区域经济合作，也是政府和企业缺乏经验而又急需处理的课题。

俞晓松指出，市场经济应是法制、信用的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对规范统一、公平、开放的市场运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无序竞争、诚信失衡等影响市场健康运行的企业行为需由社会中介组织、新闻媒体予以协调干预，使之回归正道。

俞晓松说，中国企业尽快适应经济全球化，加大管理创新势在必行，“品牌、名牌不是靠某个机构‘加冕’的，跨国公司也不能靠外部力量去‘打造’”。